

JINGDIAN

QIMENG WENKU

国学大师系列
GUOXUE DASHI XILIE
经典启蒙文库



上海大学出版社

顾颉刚

经典文存

● 洪治纲 主 编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6724464

C53

H4152

顾颉刚

经 典 启 蒙 文 库

经典文存

洪治纲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672446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顾颉刚经典文存/顾颉刚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12(2004.5重印)

(经典启蒙文库/洪治纲主编)

ISBN 7-81058-535-5

I. 顾... II. 顾... III. 顾颉刚(1893~1980)—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2593 号

经典启蒙文库

顾颉刚经典文存

洪治纲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36)

(E-mail: sdcbs@citiz.net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姚铁军

*

句容市排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237 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3 101~6 200

ISBN 7-81058-535-5/I·014 定价:18.00 元

销售热线:(021)66135111 66135112

前 言

对于二十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言,顾颉刚(1893—1980)的出现,可以说是具有某种十分特殊的意义。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顾颉刚不仅在古史研究上取得了非凡成就,提出了“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重要学说,而且还将自己在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俗学领域之中,并进而创建了极为重要的“演变法则”,使这一法则成为整个民俗研究中一直沿用至今的科学方法。这种历史与民俗的互动性研究思路,使得顾颉刚无论在古史研究领域还是在民俗研究领域,都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1893年5月8日,顾颉刚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一个读书世家,原名诵坤,字铭坚。顾颉刚的祖父、祖母和家仆都极能讲故事,所以他从小就熟悉许多神话传说和苏州的掌故旧闻。四岁时,他便入私塾,习读《四书》。1906年,入当地一所公立高等小学接受新式教育,并自学《汉魏丛书》和《国粹学报》,始受章太炎“整理国故”思想之启发。1916年,顾颉刚考入北大本科,攻读哲学。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顾颉刚适逢夫人病逝闲居苏州,于是便搜集起歌谣来。一两年里,他竟搜到歌谣数百首,以及大量的谜语、谚语、唱本、风俗、宗教传说等资料,并发现这些东西也和小说戏剧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产生变化。这一现

象,引起了他对民俗文化和民间文艺的高度关注。

1920年,顾颉刚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由于深受胡适、钱玄同等人的影响,他很快沉入到古史研究中,着手对古史进行辨伪与考证。1921年,顾颉刚任北大《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在治史过程中,他极力主张史实与传说的变迁如同故事会随时随地的变化一样,要用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以古书记载中的相互冲突作为突破口,进行动态性的跟踪与考察。1923年,顾颉刚提出了“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这一学说,推翻了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系统,将其还原为神话传说,向二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史学提出了全面挑战,在史学界引起一场大论战,从而改写了传统的古史。对此,余时英曾说,“层累说”在中国“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是文献学上一个综合性的新创造”。

与此同时,顾颉刚将自己收集的歌谣取名《吴歌集录》陆续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不料也颇获学界好评。1923年底,顾颉刚开始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的主要撰稿人。1924年,《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在《歌谣》上发表后,旋即惊动中外学术界,一时应者蜂起,提供资料、书信,讨论纷至沓来。于是,顾颉刚决定在《歌谣》上开辟专号,将征集到的孟姜女故事资料和自己的研究文章陆续登出,成为该刊所出专号中成绩最突出的一种。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的系统研究,在我国是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他对记载于各种古籍和流传于当时口头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统的考证,意在対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变化以及与历史的关系,作出尽可能科学的阐释。这使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多年来一直成为定论。1926年初,《吴歌甲集》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室出版,备受学界关注。刘半农曾写信给他:

2 “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不久,他又先后赴

厦门大学 and 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并不断地深入当地进行大量的民俗考察,发表了一系列民俗研究文章。1927年底,顾颉刚与何思敬、钟敬文等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间文艺》(后改名《民俗》),成立民俗物品陈列室,派员到韶关、云南等地考察、搜集唱本等民间文艺资料,开设民俗学讲习班,编辑出版民俗丛书,为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9年5月,顾颉刚回北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再度潜心于古史研究,决定对旧系统的古史作出清理。他认为,推翻非信史必须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人化、古代为黄金世界这四个传统观念,必须推翻古史中种族、政治、伦理、学术四个偶像。在此前提下,他着手对古史中帝系、王制、道统、经学的重要著作进行系统考辨。特别是在研究《尚书》的过程中,他发现其中《禹贡》等部分牵涉问题很多,必须进行全面的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关问题。于是,1933年,顾颉刚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次年,他又与谭其骧等人成立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使该刊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建了中国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同时,顾颉刚还将自己与他人讨论的古史古籍文章编为《古史辨》,创立了“古史辨学派”,在国内外史学界也是影响深远。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辗转西北、西南等地,先后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昆明云南大学文史教授、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主编《责善》、《文史杂志》等刊物。同时,他还在边疆各地进行大量的民俗考察,创办中国边疆学会,出版《边疆》周刊,并写出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最早专著《浪口村随笔》。

解放以后,顾颉刚先后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上海学院中文系教授、复旦大学教授。1954年调入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第一所研究员,主持标点《资治通鉴》及二十四史,并继续对《尚书》进行总结性的整理和研究,相继发表《禹贡注释》、《尚书大浩今译》等重要论文。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因病在北京逝世。

历史学与民俗学看似两个不同的领域,其实在顾颉刚的学术思想中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他着力研究孟姜女故事,主要目的就是“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其研究结果也表明,一切传说中记载的古史现象都是不可信的。他的这种新疑古派的思想与方法,以及对民间文艺进行动态考察的眼光,都曾给后人以巨大影响。特别是他在研究中所涉及到的一些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和事件,至今仍成为不少学者的研究课题。我们编选的这本《顾颉刚经典文存》,是从顾颉刚已出版的全部著作中精选出来的,主要偏重于古史学和民俗学等方面的论述与思考,它可以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在人生的道路上提供一面思考的镜子。

编者

目 录

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 / 1

中国古代史述略 / 22

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 / 34

《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 / 42

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 / 94

阴阳五行说及其理想中的政治制度 / 99

封禅说 / 103

神仙说与方士 / 106

汉代受命改制的鼓吹与其实现 / 109

灾异说和西汉的国运 / 112

尊儒学而黜百家 / 116

经书的编定与增加 / 122

经学的今古文问题 / 129

通经致用 / 134

古史系统的大整理 / 141

经古文学的建立 / 147

目

录

古史中地域的扩张 / 154

州与岳的演变 / 161

息壤考 / 193

九州之戎与戎禹 / 205

吴歌小史 / 224

孟姜女故事的转变 / 241

史籍的撰述与史料的整理 / 260

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 / 279

古史的研究与《古史辨》 / 285

顾颉刚生平及著作年表 / 301

中国近來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①

吾没有学问,不能用学问去运思,所以思想没有统系,察物不能明确。本号因为是思想问题的专号,很要就近来见闻,对于这项事实记载一二;但可恨我不懂知识论,也不懂社会心理学,没有了论辩的根本,凡所记载,不过是些浮末罢了。又僻居在此,没有多书可翻,凡所论证,都不过若忘若记的一些,与翔实二字相去太远。承同社诸位敦促成此,实在惭愧。所有纰缪、遗漏、浅陋的地方,至望阅者大大的海正。

民国八年,一月,三十一号。

一、承前的统系

吾从前以为近三十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是易旧为新的时期;是用欧变华的时期。但现在看来,实不尽然。第一: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无论如何见得突兀,既然你思想里能够容纳,这容纳的根源,就是已在意识界伏着。这伏着的东西,

^① 此文写于1919年1月下旬,原为《新潮》“思想问题专号”而作,因专号未出而没有问世。后发表于1984年1月《中国哲学》第11辑。

便是旧的;容纳的东西,便是新的。新的呈现,定然为旧的汲引而出;断不会凭空无因而至。所以说“由旧趋新”则可,说“易旧为新”则不可。第二:中国到了现在的境界,说他专受了欧化的鼓动,可有些冤枉:现在事物的外观上面,确是触处可见欧式;至于内部的精神,多半是盲从的新思想,同牢不可破的旧思想。所以要说他近来的变迁,先说他承前的统系。

(甲)在学术上面。我想了中国近来学术的变迁,虽开新的大是可悲,而承前的实在不坏。记得《新民丛报》里边,有一篇郑浩的《中国学术穷通变化论》(书不在手头,记得约略是此题),说:中国学问元、明后腐败已甚,清代的学问,是由腐败而进于精辟的境界。即此进步,自能弘通;即无欧洲科学之传播,亦当有笛卡儿、培根其人生于其间。……我想这话,并非虚诬,只因近日学者,过分受了社会的牵制,所以停滞不能进步;至于从前所取的路径,已有向科学方面走去之势,终是可信。中国的学问,向来是以礼乐兵农为实质,以文字书籍为形式;实质为形式所限,所以“居则为三皇五帝之书,用则为家国天下之政”。倘使事实与古义有所违忤,乃是事实自己的错谬,应当改造事实,使之合于古义。他们因为认定古义是不变的,所以也拿时势按捺住,不许他变。这一半因服古的心思太重,没有什么疑虑;一半因实物的考察不多,没有什么比较所致。一到了清代朴学家的手里,便不然了。他肯就实物考察,作精密的说明;又因为好古,所以要别伪存真,不管他圣经贤传都去仔细评量一回,拿从前人深根蒂固的两个习性都推翻了。他们遇见了经史上讲天文的话,就去考察天文;考天文必须习算学,就去习算学。他们晓得古人的意思是由古代的语言文学发表出来,要懂得古人的意思先要懂得古代的语言文字,所以竭力的做音韵学、文字学。遇见了讲声律的话,讲生物的话,讲伦理的话,讲社会制度的话,讲地理沿革的话,都是一一的寻根讨原,证之实境,务极

尽而后止。虽多是就零碎事物去立证,不能尽用科学的方法去驾驭事物;但明确的证据供给得多了,后来的人自然容易联络成完整的体系。清以前的学问是个“应用主义”,都悬一修齐治平的目标,看得学与用最是密切。这个意思归到根本,原是不错,但他所学的东西是不是可用的?该用的?倘是不管他所造的因,只求他所要的果,这便糟了。清代朴学家所学的只是一个“求是主义”,并不要用而且晓得他所学的并不是学的本体,乃是学的途径,离开实用尚是远得很,要费极繁难的力量才能达到真实的用,所以看那些夸言经世的是个“无本之学”,或是个“不学之夫”。这样做去虽是迂缓,却是深教人由学致用,不要轻率做去,已留下了以后用当其实的端苗了。后来科学知识灌输进来,中国的学人对他很表敬仰,就是顽固的人也得说声“西学为用”,这便是清代朴学的功效。因为朴学是向科学方面走去的,所以一旦碰见就得吸引进来。你看二三十年前那些学者,如李善兰、华蘅芳、刘铎这辈人同全国向风之士,对了数学、物理学等科何等的用心,倘使学者社会常能保持那时的热忱,到今日应如何的进步?

清代乾隆年间,中国的学问号称“义理”、“词章”、“考据”三类。但是当时义理、词章不过复演旧戏,没有什么变化,人家看得未免生厌,他的势力就渐衰微了。单是求是的考据一项方兴未艾,一方既有博学精研的学者,一方又有贵官的提倡,习成了风气,竟成了“惟考据为学问,其他均非学问”的观念。那时有两个卓犖不群的学者起来立异,开创成两个学派,与今日的学术界发生了很大的关系。这两位就是陆燿、章学诚。

今先说陆先生。从前的人看得经过重了,说他是“为万世制治之书”,所以说到经世,不管他时势合不合,总是拿经去致用。上面已经说过他们的弊病是不肯就社会的实状去考察他的需要,反将“不经世”当作“经世”,以不需要的供给他的需要,如此,安得

不窘于应务。陆先生起来,看出他们的不是,所以将近世人“切实论时下状况应兴应革”的文字钞成一部《切问斋文钞》,他的宗旨是:

以今人之文言古人之所已言与其所不必言,不若以今人之所欲言与其所必当言者以著之文。(《自序》)

这句话在学古的潮流里说出来大不容易,他晓得现在有“现在的时势”,住在现在的时势里头,应有“针对现在时势的思想”产生出来。凡义理、词章、考据等东西都不能针对现在的时势,所以都不是“现在时势的应用物”,拿学问界模仿拘墟之见大大的打破。后来魏源拿这部书扩充成为《经世文编》,他们一派的学问更见完备,就与义理等三学并立,而为“经济学”(在此只可仍旧名,不能管他与现在计学的俗名冲突改造)。陆氏此编的出版,尚在中国太平的时候。隔了六十年,内忧外患一齐来了,要筹种种的对付方法;受外国的凌辱深了,要筹种种的自强方法,经济一学,就与其他三学同应了几回考试。大家看了成绩,深晓得时势需要的学问全在经济,而不在其他,所以大家都勉力去做这番功夫,称他做“时务”,如今变称了“法政”。我写这段,提出陆先生,并非说他开今日的时势,也非说今日的政论家继承他的学问。这因他是个先觉,他开了这样的学风,兴起学人对于这项的注意研究,进益就便利了。

次说章学诚。从前人对于研究学问的方法太不考究,所以他们对于学问的“考验”、“分类”、“批评”、“应用”很是粗疏,或便缺去。有了清代的朴学,在考验方面肯用心了;有了经济学派,在应用方面又肯留神了;但是没有分类、批评,仍不能见学问的真处。章先生的学问就是弥补这缺憾的。从前人对于学问的观念迷离恍惚得很,零零碎碎的东西做得一点,无不可成为学问,只要古人有

句话我就得听他指挥,希望自己做得古人的奴仆,这便是学问的目的。古人的时代不同,心思不同,所以学问弄得割裂纷纭,要去找他共同之点,无奈但见枝叶而无从得其根干。到了章先生出来,大声疾呼的说道:书籍不是学问,考证的功夫也不是学问,学问只是“在事物上体会着,再在心思里裁断着的境界”。因为在事物上体会着,所以言是应当公的,义是应当通的;因为在心思里裁断着,所以意志是应当尊重的,虚妄是应当辟除的。至于体物施断的方法怎样呢?则在(一)分别条贯去考察他的同异,所以要做目录学;(二)探其源流去寻到他的来因,所以要做史学。这实在是科学的方法了,在那时模仿的学风里有这等的手笔,实在可为拜倒(《文史·校讎通义》不在手头,无从得实证,姑且拿我理想里的章先生写出来,待后再核)。写好了上面一段,记起我有一则日记说章先生的,拿出一看,加入上条之下,似乎重复,弃去又是可惜,我就抄出他来:

从前的时候,对于中国学问和书籍不能有适当的分类,学问只是各家各派;书籍只是经、史、子、集,从没有精神上的融和。他们心里以为学问只有一个是真,其余是伪,随各人所信,抱定了一个同其他反对起来,所以他们对于分类的观念只是“罗列不相容的东西在一处地方”罢了;至于为学的方法,必得奉一宗主,力求统一,破坏异类,并不要在分类上寻个“通观”,所以弄成了是非的寇仇,尊卑的阶级,大家看了他们的“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又没有正当的批评,凡不入党的只是过于谨慎,说“非读破万卷书,不得妄下雌黄”,所以纵是极博,总没有彻底的解悟。自从章实斋出,拿这种“遮眼的鬼墙”(此吴谚,言鬼迷人,人觉处处有墙,其实无墙)一概打破,说学问在自己,不在他人;圣贤不过因缘时会而生,并非永久

可以支配学问界的；我们当观学问于学问，不当定学问于圣贤。又说学问的归宿是一样的，学问的状态是因时而异，分类不过是个“假定”，没有彼是此非。可说在在使读书者有旷观遐瞩的机会，不至画地为牢的坐守着；有博观约取的方法，不至作四顾无归的穷途之哭。这功劳实在不小，中国所以能容受科学的缘故，他的学说很有赞助的力量。中国学问能够整理一通成为“国故”，也是导源于此。

不料这种学风的反动，倒成就了一个“今文学派”。原来中国人的习惯，看得圣人，看得经书，都是神乎其神，不是常人所可几及的东西。自从清代的朴学施下了实地的功夫，考究一番，始晓得“垂教万世的经书”乃是“一代典章的史书”，既然是部史书，则所做疏解、考证的功夫当然与史学无异。章学诚处此潮流，奋其裁断，所以说“六经皆史”；“集六经之大成者不在孔子，而在周公”。看六经是学问的材料，不拿学问当做六经的臣仆；拿从前对于经学的界说根本撤消，做经学的人只是考古，并非希圣，说得明明白白。然而那一定要崇圣希圣的人也是有的，而且朴学方法过分拘谨，那些意气发皇的人无从畅快的发泄一下，所以即不“希圣”，亦要“托圣”，他们觉得自己治经的宗旨不能与这辈考古的人去融和一口气。至于理学的经学，也已失败，不能重兴，就想法翻出西汉经学的议论创做了一个今文学派，说要做“经学的经学”，不要做“史学的经学”。那朴学家所得，不过是典章制度的粗迹，至于“笔削微旨”、“传授心法”是他们永不能见到的。单有西汉人去古较近，“微言大义”还得遗留些，所以要治经的，惟有归依这派。西汉人的崇圣程度同附会手段本是最高的，他们看得圣人的一言、一动，一出、一人莫不有“精微美妙可以赞叹”的地方，竟把孔子当了“全知全能普遍永存的上帝”，一切政治、学术、宗教都从孔子的言行里演绎

出来,所以清代的今文学派也就如法安排,保持“圣诞老人”的尊严。适此时外国来中国传基督教的人渐渐的多,他们也略略听得些教义,觉得与本学派的推尊孔子也差不多,遂立了“孔子是中国的教主”一个观念,所以今文学的影响在学术上是“深探孔子的微言”,在政治上是“提倡改制”,在宗教上是“建立孔教”。

上面所说“科学”、“国故”、“政治”、“宗教”四样,在三十年内,新有的东西固然是对了外国来的文化比较吸引而后成的,但是在中国原有学问上——“朴学”、“史学”、“经济”、“今文派”——的趋势看来,也是向这方面走去,所以容易感受新来的文化。假使中国从前的学问不是如此,则欧化进来以后,精神上的迎距、事实上的表见,决不与今日相同是可决的。——其他尚有对于新道德、新文学思想的端倪,也是我读清代人书籍所觉悟的,不过不多,吾的学问更不够批判的程度,所以不说了。

(乙)在政治风俗上面。第一道德败坏的原因。清代顶缺乏的东西无过道德,中国的道德向来不曾独立,只是靠着经书;宋儒变古,倡出理学道德,就靠在理学上面;传到明代,流弊渐多,讲学家不过“高谈心性,标榜声气”,实在是虚妄。所以清代的求实、求是的朴学家痛恨这种到极步。清初顾炎武、邵廷棻一辈人已极出力破坏。政治上,恐怕讲学的人鼓吹革命,也定做了禁令,不许有这事实。讲学虽则歇了,而所谓“义理”,所谓“宋学”,仍是存在。到了乾、嘉之间,朴学的体系大备,戴震、阮元、江藩的一辈人,对了义理,对了宋学,攻击得更厉害,以至学生看见了理学二字,即起了“伪学”的联想,虽有做“桐城文章”的几个人去提倡,那里提倡得起?打倒理学本没要紧,但是要撤销旧道德,总要建设新道德。从前的道德既是附着在理学上面,自然要使新道德附着在朴学上面,他们也有些觉悟,所以戴震做《孟子字义疏证》,阮元做《性命古训》,将道德上常用的字按着古义去解说他,希望有所改造,但

是大部分做朴学的人尚没有到这境界,不能成为风气,就难见得效果。旧道德已经废去,新道德还没有建设起来,就有了两种的趋势:一种无知无识的乡愚去拿道士派的善书做道德,还有宣讲乡约的《圣谕广训》、《劝善要言》也是同类;一种桀黠变诈的人,他在学问上得不着什么人生的归宿观念,以为道德是没有的事情,放着胆子胡乱去做。普通社会既然没有道德的学风去煽着,大家拿势利主义去作事,道德便一层层的堕落,看着道德、正义不过是文字上的装饰品;即如曾国藩的以谨厚自居,尚说要开一“绝无良心科”举人应事,虽则是笑话,就可见那时的世风了。所以愤激的理学家说“洪杨之难为朴学所造成”,这虽是责非其罪,但是他们能破坏旧道德而不能确实创造新道德,以至大家漂泊无归,是实有的事情。到了现在一切的束缚都没有了,新道德依然没有建设,所以作事更胡闹,造成这样卑鄙荒谬黑暗的社会。

第二政治社会败坏的原因。这一百年里头时势的变迁太速,学问总是追赶不上,既然没有处置时势的学问,就不得不胡乱去适应,那些拘谨的人尚是不敢乱做,只有一班无赖策士最是高兴,他们学问虽则空无所有,只是善于趋时,能够说话,无论新旧中外他都会装扮。那时需要对付时势的人很急,既没有真学问的人,就不得不拿假学问的人去冒充。这辈人便可用剽疾精悍的手段得个能名,借此幸进,去遂他“干禄”的欲望。政界里头既然开了这一门不必有实学,也不必拘资格的,大家从风而靡,都想走邪路得些便宜、侥幸,所以刘孚京说那时的世风道:

以更张为任事,以榷算为贤能,以守经为迂儒,以能言房事为宏达……古之君子学焉而经济以生,今之君子以经济为学,是使不学之人怀躁妄之心而行尝试之术也。

8 到了“不学之人怀了躁妄之心去行尝试之术”的境界,讲经济的愈